

江阴余城遗址试掘简报

江苏余城遗址联合考古队

As an organic whole, there are strong consistency in the times and cultural characters between Secheng site and Huashan site, Jiangyin. One is the walled-town, the other is the outskirts. As the greatest walled-town site of Xia and Shang dynasty found in Tai lake Area so far, it is valuable for the academic study.

Key words: Jiangyin Secheng site Xia-Shang period

内容提要 江阴余城遗址与花山遗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城,一个郊,在时代和文化面貌上有着强烈的一致性,作为太湖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夏商古城址,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江阴 余城 夏商

中图分类号 K871.2 文献标识码 A

余城遗址位于江苏省江阴市云亭镇花山村。余城遗址的形状大致呈圆角长方形,南北最长近800、东西最宽近500米,面积约30万平方米。城的范围包括了整个高家墩自然村,是一处大型城址。城址所处地势较高,其西有河流,东、南、北三面为稻田,稻田地势明显低于城墙4~5米,稻田往外,地势又复抬高,基本和城内持平。

1998年冬,由南京博物院、无锡市博物馆、江阴市博物馆组成的江苏省联合考古队在花山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确定该遗址是一处大型青铜时代遗址,当时曾对位于遗址东侧的余城进行过调查。2000年春俞伟超先生在考察花山遗址时指出余城遗址和花山遗址有着必然的联系,极有可能是一处大型青铜时代城址,应予以重视。由于自江阴至嘉定的江太公路开工在即,其北线正好穿过余城遗址南部,为避免重要遗址遭受破坏。2000年2~4月,由南京博物院陆建方(领队)、无锡市博物馆蔡卫东、李文华和江阴市博物馆刁文伟组成的联

合考古队对余城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试掘。

这次试掘共开了两条探沟,编号为TG1、TG2。其中TG1位于保存较为完整的南城墙偏西处,横跨城墙内外,探沟为南北向,面积30×5平方米,扩方5×2平方米,试掘目的是了解城墙的构筑年代、构筑方法和文化内涵;TG2位于城内靠东北处,南北向,面积10×2平方米,发掘目的是了解城内遗存的年代及文化内涵。以下就试掘工作中的主要收获,作一简要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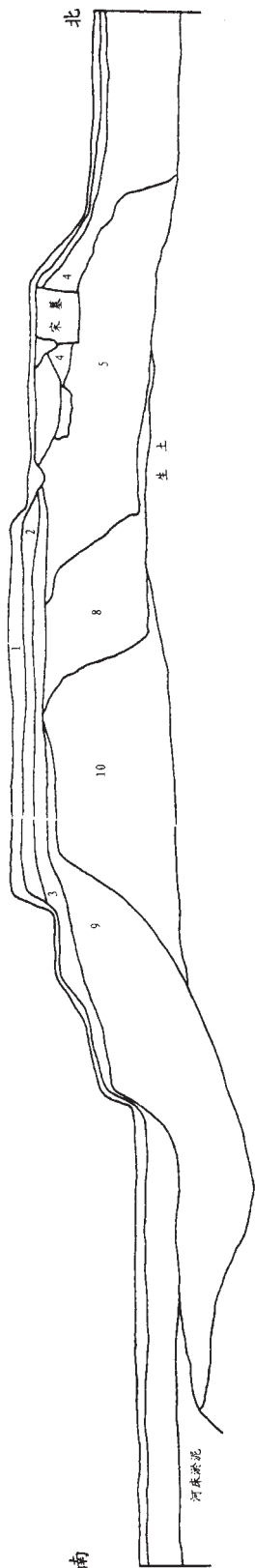
一、地层堆积

TG1和TG2①~④层的地层堆积情况大体相同。TG2④④层下叠压着一个开口于生土面上的灰坑H1;TG1⑤~⑩层为城墙墙体堆积。以TG1、TG2西壁剖面说明如下:

1. TG1西壁剖面(图一)

第1层 耕土层,灰黄色,土质疏松,厚度10~25厘米,出土印纹陶片及宋至清代瓷片。

第2层 黄色土,土质疏松,厚度10~25厘米



图一-1 // TG1 西壁剖面图

米,出土印纹陶片及宋代瓷片。

第3层 灰黄色土,杂青色斑块,粘性好,厚度20~90厘米,出土印纹陶片及宋代青瓷片。

第4层 灰色土,土质疏松,厚度30~150厘米,出土大量陶片及少量石器。陶片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其次为夹砂灰陶、泥质灰、黑陶,另有少量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片。纹饰主要为梯格纹、云雷纹、席纹、回纹、复线曲折纹、刻划方格纹、捺窝纹和圈点纹。器形主要有鼎、釜、罐、豆、钵、盆、澄滤器等。

第5层 棕黄色土,带褐色大斑点,土质纯净,粘性较好,厚度约200厘米,除了零星红烧土碎末外,几乎不含包含物。

第6层 黄色土,土质纯净,粘性较好,平均厚度为40厘米,几乎没有包含物。

第7层 褐黄色土,带青灰斑点,土质纯净,粘性较好,平均厚度为100厘米,几乎没有包含物。

第8层 淡灰色土,土质不纯,较硬,粘性差,平均厚度为200厘米,含大量被人为粉碎的陶片和红烧土块。

第9层 黄色土,杂少量黑色淤泥,土质纯净,粘性好,平均厚度约200厘米,几乎没有包含物。

第10层 黑色淤泥,杂少量黄土,粘性极好,土质和第9层一致,厚度因未挖至生土尚不明确,几乎没有包含物。

2. TG2 西壁剖面图(图二)

第1层 灰黄色耕土层,土质疏松,厚约16厘米,出土印纹陶片和宋代青瓷片。

第2层 黄色土,杂褐色斑点,土质疏松,厚约25厘米,出土宋代瓷片。

第3层 灰白色粘性湿土,夹杂细小黑斑点,厚约23厘米,出土宋代瓷片。

第4层 灰色土,杂褐色细斑点,土质较硬,厚23~65厘米,出土大量陶片和印纹硬陶,少数原始瓷片。陶片以泥质红陶为主,其次为夹砂红褐陶、泥质灰、黑陶。纹饰主要为素面,其次为梯格纹、回纹、云雷纹、条形方格纹、复线曲折纹、绳纹、弦纹等。器形主要为鼎、釜、罐、豆、盆、钵、澄滤器等,其中原始瓷器形多为钵、豆。该层下压着一个灰坑H1,H1直接打破黄色生土。

二. 遗迹

TG1、TG2从第4层起属青铜时代文化层。TG2在4层下压着一个灰坑H1,TG1第5~10层为城墙墙体部分,故也单独作为遗迹。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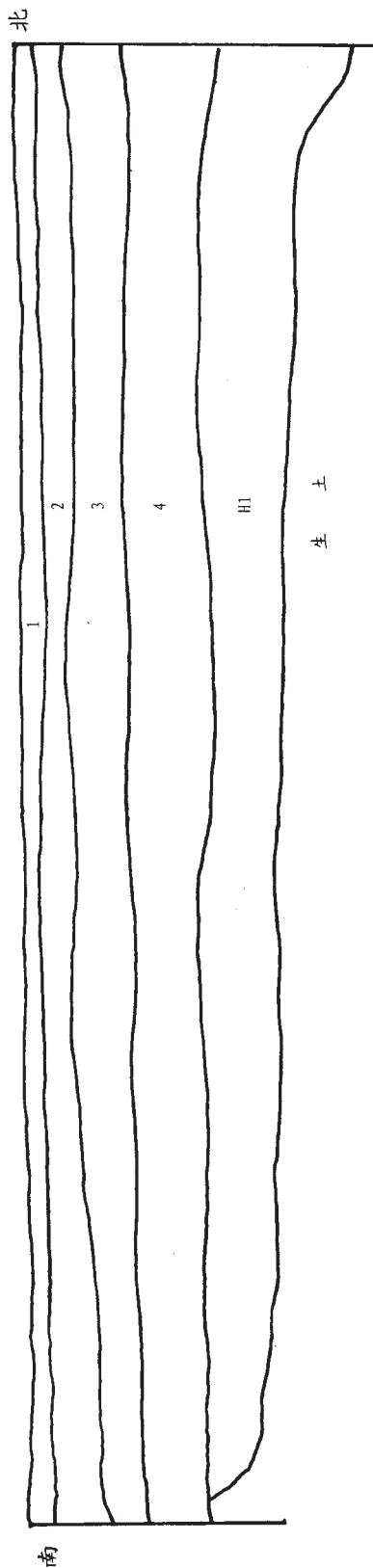
1. 灰坑

H1开口于TG2第4层下,直接打破黄色生土。H1面积较大,几乎遍及整个探沟,因未扩方,所以坑口形状不明,坑深100厘米。坑内填土为黑色淤泥。包含物有陶片、印纹硬陶、少数原始瓷片和青铜铍、镞各1件。陶器器形和纹饰与TG2第4层区别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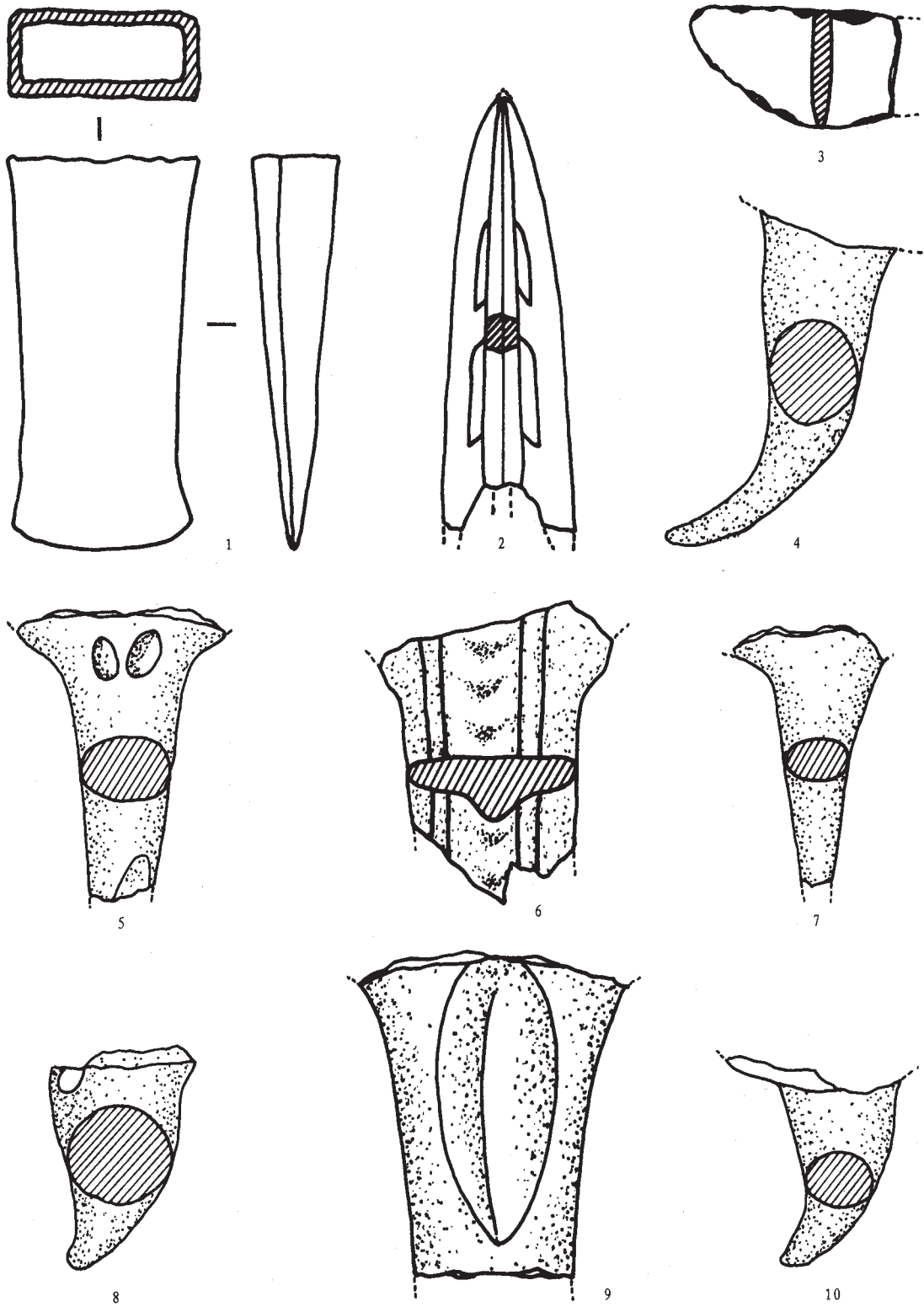
2. 城墙墙体

在TG1中,将第5~10层定为城墙墙体部分,其原因之一是第一~4层堆积均为平坦的上、下叠压式堆积,而第5~10层堆积均为斜向叠压堆积,属明显的人工堆筑形成;原因之二是在第5~10层堆积中,除第8层外,其余各层土质都非常纯净,几乎都没有包含物,这显然是为了使墙体坚固而直接取粘性好的生土堆筑成的。第8层的包含物也是经人工粉碎的陶片和红烧土块,且这一层土质坚硬,也显然是人为加固过的;原因之三是第5~10层最高处要高于第4层最低处3米,在第10层南面呈明显的坡状下延,坡角被淤泥层覆盖,我们推测是原护城河所在,而坡底至坡顶相对高度近5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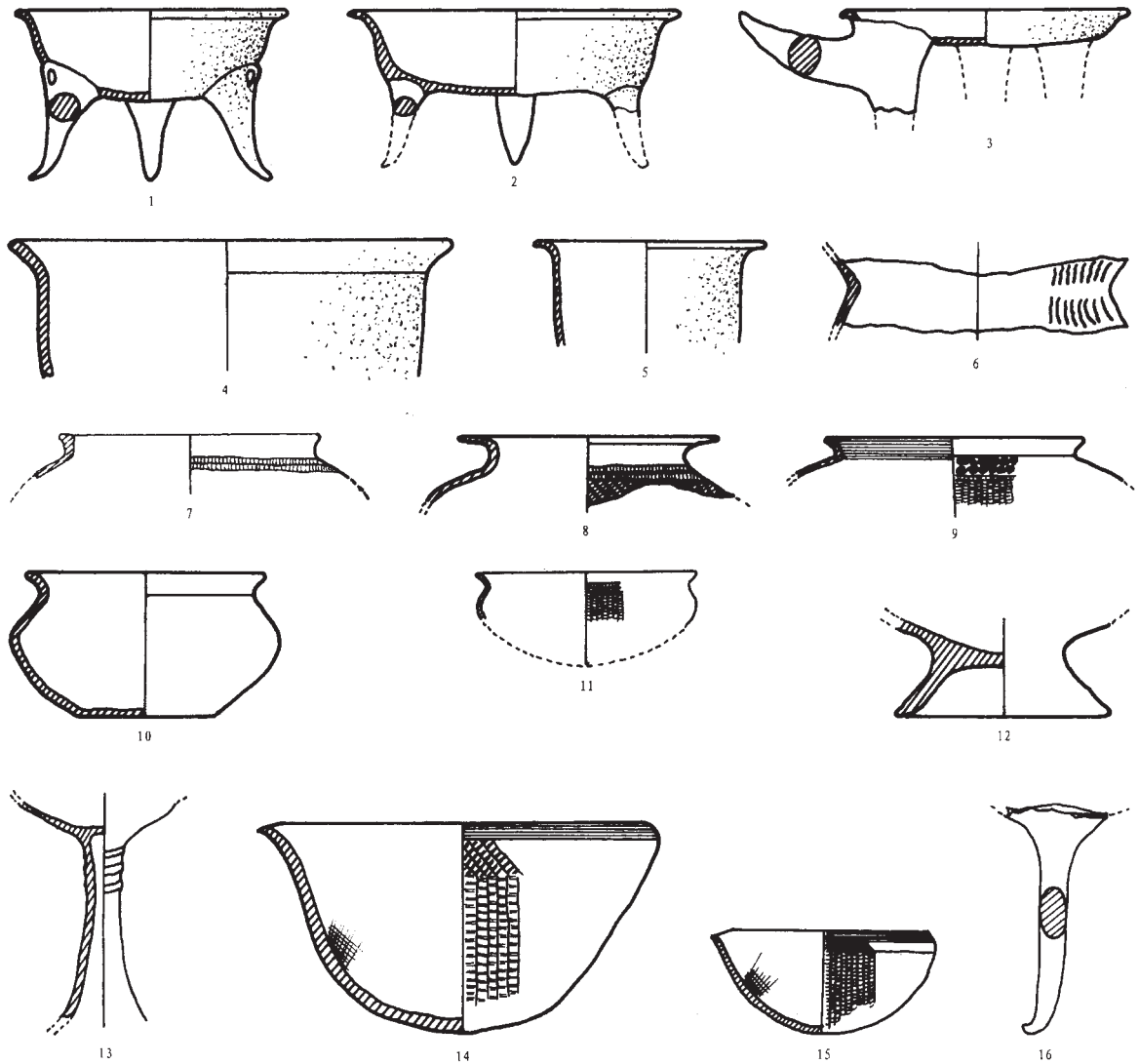
城墙的堆筑是由南向北和由西向东两个方向挑土堆成的。最先堆筑同时也是最富特色的是靠南部的第10层土,这层土主要为灰黑色的淤泥,其中掺有少量黄土,土质极为纯净,粘性好,几乎不含任何包含物,堆成后呈上窄下宽的山坡形。它与覆盖它的第9层土的剥离十分明显,剥落面异常光滑,从上而下有无数平行的流线,整体略呈波浪起伏状,未见任何夯击和拍打痕迹,并且这种显然经过人工处理的土面在整个第10层土中不止1层,由外而内可以剥出多层,每层厚度约3~4厘米。由于这种取自河沼地带的黑色淤泥具有相当大的湿度和流动性,所以其表面形状当是淤泥自然流动后形成的。由于淤泥密度大,粘性足,干后极为牢固,所以将它作为城墙的核心部分显得别具匠心。叠压在10层上的第9层土以土质而言和第10层完全一致,但是淤泥和黄土的比例刚好相反,这一层是在大量纯净的黄土层中掺有少量的黑色淤泥,如果说第10层是湿土层的话,第9层就是干土层,这层土堆成后坡度明显缓于第10层,它向南下延至和护城河相接,北面被另一种土质的第8层土斜向叠压。第8层为淡灰色土,土质不纯,粘性差,掺有大量红烧土和被人工粉碎的陶片,显然是取自生活区的熟土。第8层土较为坚硬,从剖面观察呈块状堆积,虽然在平面上没有发现明显的夯窝和拍打痕,但无疑经过某种方式的加固处理。8层只见于墙体中段的西部,它同时被其北面的第5层和东面第7层土斜向叠压,第6、7层也只在探沟北部的东面存在,第5层则在探沟北部全面存在,同时叠压了第6~8层。第5层土土质也很纯净,土色呈棕黄色带褐色大斑点,粘性好,除含有星星点点的红烧土块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包含物,土质和探沟北部的生土土质完全一致,显然是就地取土堆筑。就墙体而言,5层土是最晚的堆积,其北部在剖面上呈较陡的斜坡状。斜向叠压其上的第4层为灰土层,土质不纯,其中出土了大量马桥文化类型的陶片和少数石器,陶器有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红褐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形主要为鼎、釜、盘、罐等,石器多为半月形石刀,可见这已是城内生活区的堆积。城墙是直接堆筑于生土上的。探沟南部城



图二// TC2西壁剖面图



图三// 青铜器、石器、鼎足
 1. 青铜铤 2. 青铜镞 3. 石刀 4~10. 夹砂陶鼎足



图四// 夹砂陶、泥质陶

- 1、2. 盆形鼎 3. 带把盆形鼎 4、5. 釜 6. 甗 7. I型罐 8、9. II型罐
10. III型罐 11. 盆 12. I型豆 13. II型豆 14、15. 澄滤器 16. 三足盘

墙上下落差为5米。第9层最南部被极为潮湿的青黑色淤泥覆盖,推测是护城河水位逐渐抬高,淤泥漫上了墙脚所致。探沟北部城墙最高处至生土距离为2.6米,整个城墙南北宽约20米。

三. 文化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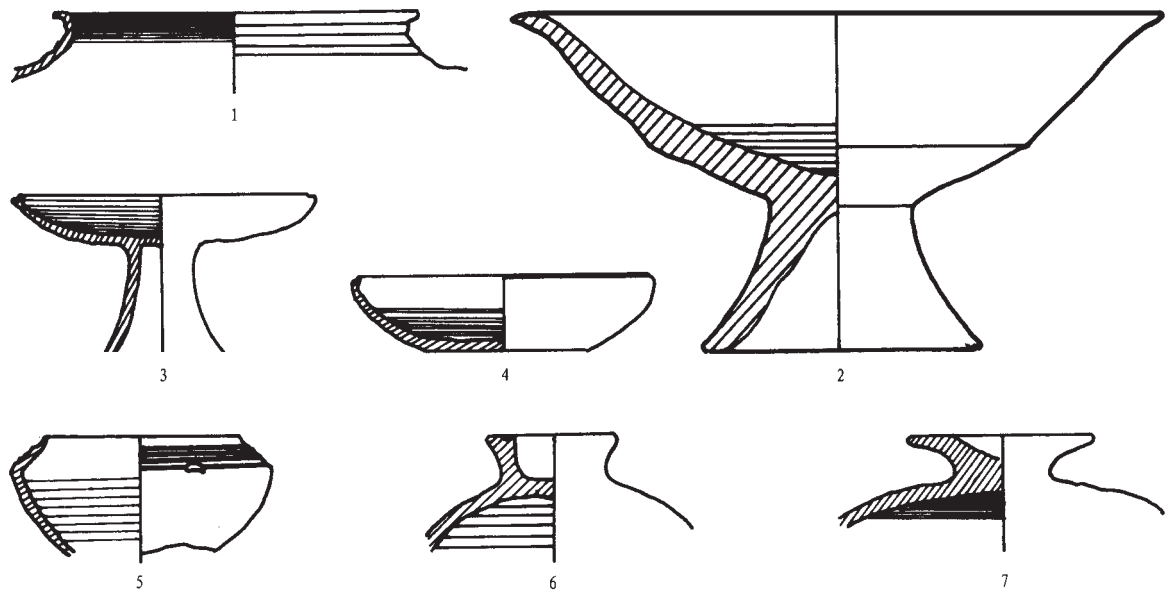
本次试掘出土文化遗物有青铜器、石器和陶器,其中青铜器2件,石器1件,陶片1292片,陶器可复原者9件。现分别介绍如下:

1. 青铜器

2件。铜铈,1件,H1:27,长条形,弧刃,釜中空,范铸,两侧有范线,釜内有残留的木碳痕,长6.1、宽3.3、厚1.5厘米(图三:1)。青铜镞,1件,H1:28,有脊,带双翼,脊与侧锋之间镂空,铤已残,残长7.2、宽2.3、厚0.9厘米,范铸(图三:2)。

2. 石器

在TG1覆盖于城墙坡角上的淤泥层中出土



图五// 硬陶

1. 罐 2. I型豆 3. II型豆 4. I型钵 5. II型钵 6、7. 器盖

一把半月形石刀(TG1 於泥层: 3),已残断,由青灰色页岩磨制而成,刃部有明显使用痕迹,风化剥落较严重,残长 7.2、高 4.0、厚 0.6 厘米(图三: 3)。

3. 陶器

本次试掘出土陶器的陶系分夹砂陶、泥质陶和印纹硬陶及原始瓷,制法大致有手制、泥条盘筑后慢轮修和快轮制等。依用途分为炊器、盛食器。

(1) 夹砂陶

器形主要有鼎、釜、甗,均为炊器,绝大多数为红陶、红褐陶。

鼎 出土鼎足虽不少(图三: 4~10),可复原的鼎数量却不多,可分盆形鼎和带把盘形鼎两型。

盆形鼎 标本 TG1 ④: 11,夹砂红陶,圆唇,翻沿,侈口,弧腹内收,圆锥形足,足尖外撇,足根部有两捺窝纹,素面,轮制,口径 21.50、通高 13.6 厘米(图四: 1)。标本 TG1 ④: 13,夹砂红陶,圆唇,翻沿,侈口,圆锥形足,足尖外撇,素面,轮制,口径 26、残高 9.2 厘米(图四: 2)。

带把盘形鼎 标本 TG1 ④: 12,夹砂红陶,浅盘式,翻沿圆唇,羊角形把手,圆锥形足,素面,轮制,口径 22 厘米(图四: 3)。

釜 均不可复原,结合 1998 年花山遗址发掘出土的筒形釜来看,二者在陶系、制法和器型上都

很一致。标本 TG1 ④: 4,夹砂红褐陶,圆唇,斜沿,侈口,胎呈灰褐色,表面有许多气泡,素面,轮制。口径 34、残高 10.5 厘米(图四: 4)。标本 TG1 ④: 18,夹砂红褐陶,圆唇,斜沿,侈口,直腹,胎呈黑灰色,器表有许多气孔,施红陶衣,剥落严重,素面,轮制,口径 36、残高 9.6 厘米(图四: 5)。

甗 均不可复原的,仅见甗腰 1 件。标本 H1: 1,夹砂红褐陶,绳纹,手制,器壁有许多石英砂粒,腰径 20、残高 6 厘米(图四: 6)。

(2) 泥质陶

泥质陶在所出陶器中所占比例最大,器形主要有罐、盆、豆、澄滤器,除了豆多为素面、轮制外,其它器形多为泥条盘筑,并拍印各种纹饰。

罐 有平底和凹圆底,可分三型。

I 型 直口罐。标本 H1: 10,泥质红陶,方唇,较厚,直口,圆肩,饰梯格纹,泥条盘筑加轮修,口径 20、残高 3.6 厘米(图四: 7)。

II 型 侈口罐。标本 H1: 9,泥质红陶,圆唇,斜沿,侈口,圆肩,饰云雷纹、梯格纹,泥条盘筑,轮修,口径 20、残高 5 厘米(图四: 8)。标本 TG1 ④: 29,泥质红陶,尖圆唇,短颈,侈口,鼓肩,饰梯格纹,泥条盘筑,轮修,口径 20、残宽 12.8 厘米(图四: 9)。

Ⅲ型 小罐。标本 TG1 ④: 20, 完整, 圆唇, 斜沿, 侈口, 斜肩, 弧腹内收, 小平底, 素面, 轮制, 口径 9.3、通高 5.6、底径 5.2 厘米(图四: 10)。

盆 标本 H1: 11, 泥质红陶, 圆唇, 斜沿, 侈口, 有肩, 弧腹, 圜底, 拍印梯格纹, 泥条盘筑, 轮修, 口径 34、残高 7 厘米(图四: 11)。

豆 可分二型

I型 矮把豆。标本 H1: 16, 泥质灰陶, 矮圈足, 素面, 轮制, 足径 8.4、残高 3.4 厘米(图四: 12)。

Ⅱ型 高把豆。标本 TG1 ④: 21, 泥质灰陶, 豆把饰轮制时留下的箍纹, 轮制, 残高 18.4、豆盘残宽 13.2 厘米(图四: 13)。

澄滤器 泥质红陶, 口部饰弦纹, 外饰梯格纹, 内刻斜方格凹槽, 泥条盘筑。标本 TG1 ④: 27, 尖圆唇, 敛口, 圜底, 带流, 口径 32、高 16、壁厚 1 厘米(图四: 14)。标本 TG1 ④: 28, 方唇, 敛口, 带流, 弧腹圜底, 口径 30、残高 15.2、壁厚 1 厘米(图四: 15)。

三足盘 未见可复原者, 仅见盘足 1 件, 标本 TG1 於泥层: 1, 泥质灰陶, 侧扁形, 足尖外撇, 素面, 手制, 残高 17.6 厘米(图四: 16)。

(3) 硬陶

硬陶和原始瓷在器物的选料、成型工艺上都一致, 可定为一个陶系, 原始瓷无可复原的, 所以只介绍硬陶。硬陶的胎通常为青灰、灰白或灰红色, 夹细砂, 器形有罐、豆、钵、器盖等, 素面者均为轮制, 拍印纹饰者为手制。

罐 标本 H1: 24, 硬陶, 青灰色胎, 方唇, 平折沿, 直口, 鼓肩, 沿面饰弦纹, 轮制, 口径 22、残高 4.5 厘米(图五: 1)。

豆 可分二型

I型 标本 TG1 ④: 1, 硬陶, 胎色灰红, 豆盘为敞口, 尖唇, 浅腹, 喇叭形豆把, 素面, 轮制, 口径 20、通高 10.2、底径 8.5 厘米(图五: 2)。

Ⅱ型 标本 H1: 21, 硬陶, 橙红色胎, 豆盘口微敛, 盘沿有子口, 浅腹, 盘内有轮制留下的弦纹, 喇叭形高圈足, 素面, 轮制, 口径 18.4、残高 10 厘米(图五: 3)。

钵 可分为二型

I型 标本 H1: 20, 硬陶灰胎, 敛口, 口沿有子口, 浅腹, 弧腹内收, 小平底, 内壁有轮制留下的弦纹, 素面, 轮制, 口径 18、高 4.6、底径 10 厘米(图五: 4)。

Ⅱ型 这一类型的钵, 结合花山遗址出土的同类型器物看, 底分平底和矮圈足两种。标本 TG2 ④: 4, 硬陶, 红胎, 尖圆唇, 敛口, 折肩, 弧腹内收, 肩饰凸弦纹和半月形堆塑纹, 轮制, 口径 12、残宽 12 厘米(图五: 5)。

器盖 标本 TG1 ④: 3, 硬陶, 橙红色胎, 盖里有明显的轮制旋痕, 捉手呈圈足形, 素面, 轮制, 捉手直径 4、残宽 8.4 厘米(图五: 6)。标本 H1: 23, 硬陶, 胎灰红色, 盖内有明显的轮制旋痕, 捉手呈圈足状, 素面, 轮制, 捉手直径 5.5 厘米(图五: 7)。

四. 小结

如前言所述, 2000 年春, 俞伟超先生在考察江阴花山遗址时即指出, 余城遗址和花山遗址有着必然的联系, 很可能同属一个大遗址群, 通过这次试掘证明了这一观点, 所以我们在分析余城遗址的年代和文化性质时, 必然要和花山遗址结合在一起。

在余城遗址的两条探沟中, TG1 第 4~10 层是青铜文化层, TG2 第 4 层、H1 是青铜文化层。TG1 中第 5~10 层为城墙堆积, 其中只有第 8 层有少量陶片, 但是统观 TG1 第 4、8 层、TG2 第 4 层、H1 中所出陶片, 无论在陶系、器形还是制作手法上都没有明显的区别, 所以我们认为先民在该遗址的居住使用有延续性, 虽然地层的区分意味着相对年代的区别, 但器物的一致说明了文化性质的统一。

余城遗址陶炊器有鼎、釜、甗 3 种。鼎均为盆形鼎, 有的还带角状把手, 不见花山遗址所出罐形鼎。这种足尖外撇的盆形鼎始见于马桥文化时期, 与之相类似的鼎在吴县越溪张墓村^[1]、澄湖古井^[2]、吴县郭新河^[3]、镇江马迹山^[4]、句容白蟒台^[5]均有出土, 同时, 出土的遗物有带有典型马桥文化特征的, 有带有早期湖熟文化特征的, 也有二者兼具的。

在本次发掘中出土甗腰 1 件, 束腰、绳纹, 根据张敏先生对湖熟文化的分期, 这类甗大致相当于湖熟文化二、三期之间^[6]。

釜是余城和花山遗址较为独特的一类炊器。在距今 6000~7000 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 釜就是太湖流域先民的主要炊器, 到崧泽文化时期, 釜逐渐被鼎取代, 重新见到釜是在浙江良渚文化久山湖遗址, 但这时的釜已不同于马家浜文化时期的腰沿釜, 而是宽斜沿、缩颈、圆腹圜底, 釜身饰绳纹, 虽然形制和花山、余城的釜还有较大差别, 但

宽斜沿这一特征是相似的^[7]。上海亭林遗址中层H2的器物群具有典型马桥文化面貌,所出夹砂宽沿釜的形状和花山、余城宽沿釜已大体相似^[8]。

余城的盛食器以泥质陶的罐、盆、豆为主要组合,还有三足盘和澄滤器,硬陶有罐、豆、钵,硬陶器盖当和豆、钵配套使用。和炊器不同的是,余城的盛食器无论在器型还是纹饰上都有很明显的湖熟文化特征。类似的器物在北阴阳营、城头山、团山、点将台、胥庙、甘草山等典型湖熟文化遗址中都能见到^[9]。而细高柄带凸棱的豆和灰陶三足盘既见于典型的湖熟文化遗址,也是马桥文化之后的亭林类型的典型器物。余城遗址中湖熟文化类型器物,约相当于湖熟文化的二、三期,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600~1000年,相当于二里岗下文化层至西周初。至于带有点将台文化特征的湖熟文化一期器物和周代吴文化特征的器物在本遗址中都未见到,但从余城遗址的硬陶罐、豆、钵等器物看,和后来的吴文化同类器物有着很明显的承接关系。

余城遗址陶器,早期带有马桥文化器物特征,晚期又具有很强的湖熟文化特征,但由于它不见马桥文化器物中鸭形壶、觚等标志性陶器,也不见湖熟文化以鬲为主的炊器,所以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将该遗址归入单纯的马桥或湖熟类型遗址中去。联系到江阴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正处于长江南北和太湖、宁镇地区交通的十字要冲,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当地古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但是余城遗址的器物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地方特征,例如在炊器中釜占了一定的比例,内部带刻槽的澄滤器大量出现,这两点在花山遗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两个遗址虽然都属试掘,发掘面积总共不到700平方米,但出土釜和澄滤器的总数已超过历年所发掘的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各遗址中这两类器物的总和。另外,梯格纹是湖熟文化器物的一种典型纹饰,而在余城遗址和花山遗址的陶器纹饰中,梯格纹所占比例极大,分别达到31.50%和12.26%,也远远超过宁镇地区各湖熟文化遗址中梯格纹所占比例。不管是余城遗址还是花山遗址,目前发掘的面积都只是整个面积的极少部分,出土的器物 and 遗迹现象都还不足以使我们能对遗址的文化性质作全面而准确的推断,这还有待于下一步工作去解决。

我们在研究余城遗址时,有两点始终是要值得注意的。其一,余城遗址是个青铜时代城址,所以它既有通常青铜时代的共性,也有作为一个城

址的特殊性;其二,余城遗址和花山遗址应当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一个是城,一个郊,它们在时代上具有一致性,文化面貌也是一致的。

我们将余城遗址和花山遗址出土陶器加以比较后发现,余城遗址炊器中不见花山遗址较为多见的罐形鼎,釜的数量也远远少于花山遗址,而以足尖外撇的盆形鼎为主,当然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余城遗址发掘面积较少所致,另一方面可能也意味着城内的遗存会稍稍晚于城外,因为罐形鼎和釜的时代都是早至夏、商时期的。另外,在余城遗址的TG2中,硬陶和原始瓷的比例占到14.19%,远远超过花山遗址的3.17%,这除了可能是城内遗存年代略晚所致,也可能意味着城内居民所用器物的规格更高于城外居民。H1中所出的镂空青铜镞,形制特殊,工艺精湛,显示出了极高的青铜铸造技艺,显然不是一般实用器,而更具礼器的可能性。

余城遗址的城墙堆筑采取了干湿土混用的堆筑方法,不见北方城墙常用的夯筑、版筑迹象,反映了当时南方筑墙的区域性特点。

此次试掘,由于发掘面积和遗物数量的有限,我们尚不足以对遗址的年代和文化性质作十分准确的判断,但余城遗址作为同时期太湖地区最大的一个古城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参加整理人员 蔡卫东 李文华 刁文伟
执 笔 蔡卫东 刁文伟 李文华
绘 图 蔡卫东 刁文伟

- [1] 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越溪张墓村调查》,《考古》1989年第2期。
- [2]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苏州文物资料选编》1980年。
- [3] 姚勤德《江苏吴县南部地区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第10期。
- [4] 镇江博物馆《镇江市马迹山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11期。
- [5] 刘建国、刘兴《江苏句容白蟒台遗址的试掘》,《考古》1985年第3期。
- [6] 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谱系与族属研究》,《南京博物院建院60周年纪念文集》(1993年)。
- [7][9] 芮国耀《良渚文化研究》,未刊稿。
- [8] 黄宣佩、张明华《上海地区古文化遗址综述》,《上海博物馆集刊》1982年。